导　论

一个被标注为“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时代，甚至学者们言必称“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社会经历着激剧而复杂的变化。在这个时代，如何穿透物质环境坚硬的外壳，使隐藏其中的可能性凸现出来，已经成为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环境的暧昧性塑造了激进理论的暧昧性：曾经唤醒了 20 世纪革命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不再被知识分子读成一种面向解放的实践，作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作者的马克思一下子变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预言者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正面论证者。[①] 虽然有学者反复强调，马克思仍然构成我们今天激进地思考未来

①在一片意识形态狼籍图中，如贝克所描述的那样：马克思如今不再是自由作家和批判的批判家，而是成了世界银行的雇员、全球化了的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掮客或经济记者，用不同的笔名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或《明镜》上发表文章；《资本论》第四卷将作为看不到结尾的系列丛书以世界各种语言出版：“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由盛而衰的东南亚”“我们将变得富裕、越来越富裕”……在东西方冲突时期，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德国被纳入宪法保卫机关的管辖范围、并受到职业禁令的威胁的东西，今天在全世界各主要报刊中都可以看到——无任何不良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失败与胜利——在《共产党宣言》出版 150 年以后——变得难以分辨。甚至可以说，失败被当作胜利：马克思已变得多余，因为尽人皆知，他已失去马克思的本来意义。全球化也成了没有马克思的资本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乌·贝克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 页）如果这说得还不够通俗的话，那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共产党宣言》成为华尔街金融家抢手读物”这样的报道出来以后，在马克思成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专家正面引用的作者之后，马克思也就被人们解读为“布尔乔亚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也就与作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关系。在中国，我们也能从大量的有关“新经济”的通俗读物中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例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绝对视域,但是由于马克思可以“缺席”或“不在场”,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个体知识分子生存体验的一种公开表达。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和社会主义逐渐被某些“新激进主义”分子视为异己的甚至从来都不曾在历史上“在场”过的东西。例如,“第三条道路”激进政治精神领袖和理论中坚吉登斯宣称,那个搅扰了欧洲资产阶级美梦的共产主义“幽灵”,虽然在过去 70 年中获得了坚实的存在,但是如今已经被送回了它的地下世界,激进主义者对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可以实现的“真正自由”的社会的期望似乎已经落空。①

如果说吉登斯的“告别革命”表达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情绪,它是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不过,作为一种历史的宣告,隐藏在其中的某种私下利益却并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全球化并没有终结历史,自由主义许诺给世界的“自由与繁荣”也远远没有到来,相反,以“第三道路”重新纠合起来的“北约”虽然把自己打扮成黑格尔意义上的那个“普遍国家”或者“绝对理性”,但它却很吝啬,把鲜花只留给自己,而扔给别人的则是炸弹。正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新的矛盾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期待,在这种期待中,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重新发明革命”的口号在西方左派或激进主义阵营中也并不鲜见。换句话来说,作为激进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进入休眠状态甚至被送回到它由以诞生的地下,应该说它仍然在听从着时代的召唤。本文评论的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的“新激进政见”,作为对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左派反应,它强调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新形式的控制或支配问题(即霸权问题),在解放政治意义上主张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替代。在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德里克以其独特的对时代的体验和灵活的政治视角有说服力地强调了在当代复杂的历史环境

①[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中任何对于时代的激进思考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整体解放诉求提供了一种参照、一种借鉴。

第一节　德里克其人：学术和政治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 年～），著名的汉学家，左派学者，现任美国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他出生于土耳其，曾立志于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以工程专业完成大学学习，后赴美研究科学。但是，到达美国后，他很快就抛弃科学研究而全身心转向历史，选择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专攻领域，在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完成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专题的博士论文，并于 1978 年发表《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在相当长时间内，他对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激进运动中的社会革命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公开出版了《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深入田野和工厂的学校：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和上海国家劳动大学（1927—1932）》（合作出版，*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Anarchists，the Guomindang，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1927－1932*）等大量论著，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这一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以说，对于中国，他情有独钟。近年来，他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而且同他人合作编辑了不少有影响的论著，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后现代主义与中国》（*Postmodernism and China*）、《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视角》（*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等。20 世纪 90 年代，他以独特的历史视角介入文化研究，

在“全球化与地域”这个专题中发表了大量的激进论见。这些著作包括他独立撰写的《革命之后 警觉全球资本主义》(*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后殖民氛围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The Postcolonial Aura :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以及与他人合作编撰的《作为文化产物空间的亚洲／太平洋》(*Asia/Pacific As Sp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边界之上是什么 关于太平洋地区思想的批评视角》(*What Is in a Ri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Region Idea*)、《后现代性的历史》(*Postmodernity's History*)、《三个世界之后的历史》(*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地方和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学》(*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等,凭借这些著作，他在国际学术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其学术路径看，德里克大致经历二个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一个被广泛引述的历史学家，其主攻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90 年代以来，特别是以《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首发于《批评探索》第 20 卷第 2 期，1994 年冬季号)为重要代表作跻身于第三世界(文学)批评,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锋,其关于‘全球化’、‘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的论见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兴趣，他并因此被一些学者视为“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代表人物,[①] 他的有关论著也被列为许多大学文学系的参考文献。

① 值得注意的是,“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都是含义并不确定的术语,它们包含了诸多立场相左、风格迥异的理论家。就德里克而言,‘后殖民主义’是其理论的批评对象,他本人就使用‘后殖民论’(post-colonial argument)来界划自己的讨论对象。(参阅,“后殖民还是后革命？后殖民批评中的历史问题”,载《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在《后殖民理论》中,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区分了“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和“后殖民批评”,在他区分的意义上,德里克是一位‘后殖民批评’家,而不是‘后殖民理论’家。(参阅,《后殖民理论》,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从其政治立场看，德里克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说来，他也算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①] 诚然，我们可以从德里克大量的激进论见中直接感觉到这一点。或许因为这一点，以‘新型的未来可能性想像’为基调的‘革命’，不仅是其理论研究的核心对象之一，而且也是其所持的左翼激进主义立场。不过，仅仅这样论断也是不够的。因为，在 20 世纪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左翼知识分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并非是确定的。例如，肇始于 20 年代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狭义的政治思潮在 60 年代末就终结了，而由 1968 年“五月风暴”直接催生的“新左派”显然不仅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很大的距离。[②] 随着“人道主义”这个资产阶级梦想的破灭，在左派那里，“主体”也开始死亡，福柯式的史学操作终结了过去的时代，后结构主义理论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关于“差异”和“少数族群”的权利也随着对资本主义宏大叙事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而成为左派的话语。 90 年代更甚，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操作，地方性知识与革命的关系也在新的层面上展开，呈现与先前历史不同的整合特征。

德里克的理论研究无疑受到上述左派运动的主题变换和形式转移的影响，这正是其“后革命激进政见”得以出台的思想史背景。正是从这个背景出发，我们将看到，他的“后革命”观不仅是对全球化话语中的“反革命”思潮的一种戏讽，而且实际包含

① 参阅王宁为德里克中文文集《后革命氛围》所作的编者前言，[美]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② 当然，这里的“新左派”也是广义而言的。就其狭义说，它是在 50 年代形成的一个术语。在苏共 20 大以后，在大量左派知识分子右转背景下，这一术语指那些不同于传统但仍然坚持左派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广义上，它与“新社会运动”具有重叠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清算”，从而他实际地导向一种以“历史想像力”为基础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解放议程。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弹性生产相对的左派激进主义（或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弹性政治，“后革命”深刻地反映了德里克冲破当前“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对立的意图。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遭遇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境遇，并更进一步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中的“深刻暧昧性”（profound ambiguity），把这种‘暧昧性’视为一种后现代式的‘爱恨交织的品质’（the virtues of ambivalence）。从这一点出发，他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为“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之理论启示和实际范式（paradigm）。[①]

第二节　新激进主义：“后 68”传统

如果以一句话来概括德里克的理论旨趣，那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批判。从资本主义批判史来说，“全球资本主义”可以意味着资本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不过，它也可能仅是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而“批判”作为一种形式，在 20 世纪的学术与政治中，也并非具有确定的含义。为此，我们必须从德里克的理论特质入手来揭示其形式特征。

德里克曾说过自己的工作主要受到了三个人的影响：马克思、毛泽东和陀斯妥也夫斯基。我们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来说明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最直接的可能会使人想起 1968 年的“红五月”，因为在那时，巴黎街头飘扬的旗帜上写着三个“M”（即

① 参阅 Arif Dirlik：*After the Revolution：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Hanover and Londo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4，第四章。

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当然我们不能以这种文学式的想像替代严肃的研究,不过把德里克归入“后 68”时代的新史学传统孕育出来的激进历史学家却是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他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深刻地带有这个传统的痕迹，而且他对这个问题本身有着自觉的认识。事实上，他的激进立场的来源与风格，他对历史本体论的关怀和历史言说的方式与后现代之曲折关系，以及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解等等问题，只有在这个传统中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再现。

后殖民理论的研究者巴特·穆尔—吉伯特(Bart Moore-Gilbert)认为,德里克的‘后殖民氛围’是在艾哈迈德(Aijaz Ahamad）等人的激发下形成的，此言不虚。如果考虑到“后殖民主义”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逻辑失败之后由活跃于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出身(of third world origin)的西方知识分子群体所操持的一种批判话语，那么我们将看到德里克似乎与这一话语具有天然的亲和性。事实上，德里克在一次访谈中也谈到自己作为一名激进学者与第三世界出身具有直接的联系。① 不过,如果说由于自己的出身，德里克就必然选择了与萨义德(A. Said)等人同样的知识视角的话，那也过于简单了。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德里克在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价值上真实地影响了那些非资本主义地区(这是后殖民理论的核心论点之一)的同时,他也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形成是通过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国家共谋来实现的，因此他更强调必须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扩散这一事实进行批判。这一点不仅是德里克批判其理论的实际根据，而且是为后殖民理论所不及的深刻性所在。

① 参阅 *Dimensions of Chinese Anarchism: An Interview with Arif Dirlik*，载 Http://www.hku.hk/compli/staff/lee_chinaaer1.htm

应该说，德里克声张的激进主义并非简单地源自其第三世界身份而对革命的天然同情，而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激进理想的某种延续。毫无疑问，德里克的历史认识属于 60 年代以降的美国激进史学新传统，特别是在他所擅长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内，与柯文(Paul Cohn)所言的‘ 中国中心史观 ’(China-centered approach 或 China-centered history)趋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要求摒弃历史研究之帝国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历史目的论。① 但是，在历史研究上，他本人实际持有的立场并不直接导向‘ 中国中心 ”,因此与弗兰克在 90 年代所言的对世界史的再定位或扭转(reorient)并非一致,虽然二者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问题上具有同样的立场。依德里克的观点，二者实际立场可能正好与中文语境相反。他本人要求在中国史研究中激活中国的独特性，而弗兰克则要求把世界史的中心转向东方。德里克认为，弗兰克借排除欧洲中心主义之名，以与经典经济学十分相似的方式来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化了。② 我们看到，激进史学理论的背景也正是 60 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 ,妇女解放、种族问题以及生态问题等进入历史学的视野，德里克对此有着自觉的意识。在讨论‘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 ’的论文中,他强调:“1968 ”不仅仅只是普通的一年，而是一种时间性的象征，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不同的持续和边界。最重要的是标志了一种与以往的历史思维方式的

① 20世纪 70 年代，在有关中国历史的评论中，德里克表达了这样的立场：“ 中国历史,拥有它自己的过去,也应该成为其为未来的仲裁者。”他认为柯文的‘ 中国中心史观,,与这种情感是交迭的。(参阅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Note in the contemporary Hisorigraphy of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2 No. 3, July 1996) 事实上,这个观点,在 90 年代研究中，德里克也以不同的方式作为一种历史意识运用于地域政治学中。

② [美]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 页。弗兰克的文献参阅《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决裂的要求。① 事实上，这一解释也说明了他自己在历史研究中采取包容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原由。② 更进一步，在这个激进传统中，就反对帝国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而言，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把世界体系分析的成果实际地注入这一传统同样是德里克的理论旨趣。③ 当然,更为深层的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等重大问题的立场都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或许这是他通过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得到的最大收获。虽然德里克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理解可能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已经相去甚远，但不管怎样，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其中的命运）的分析，受益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④ 正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不仅拉近了中国历史研究和“后殖民批评”之间的距离，而且对整个现代思想都提出了极为独特的看法。

德里克虽然也称自己的理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但

① [美]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载《中国学术》,总第 5 辑,2001 年第 1 期。

②正是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这一关于新的历史认知的文献中，德里克非常明确地强调,在 1968年之后的历史中，人们发现“新的历史起因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但是通过对在现代主义历史叙事中它们被压抑的方式的质问，它们本身在历史中促生了后现代主义”。由此，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提问方式成为可能。事实上，“与过去激进的断裂的同时宣告了激进主义本身的终结。 1968 年的那些激进想像的失败让历史失去了指南针，那些新的历史——它们不是重新展望历史——在对渗透于现代激进主义的大前提的质问中走向终结，而这种激进主义则是由它本身反对的作为一种支配结构的普遍主义的假定促成的。”(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载《中国学术》,总第 5辑,2001 年第 1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德里克的激进史学纳入“后 68”传统进行讨论。“后 68”传统这个术语除了指有别于 1968年之前的激进主义的新型传统没有别的含义。关于这种命名方式的矛盾性,参阅第三章有关“后殖民”与“后革命”等术语的分析。

③ 其 70 年代的历史研究明显地反映了世界体系取向的影响。参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202 页注 47。

④ 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

他似乎更愿意使用“新激进政见”来表达自己的观点。[①] 这其中具有复杂的原因，而最为重要的无非是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在现代性问题上围绕‘革命’的争论，80 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所引起的国际学者对社会主义问题看法的变化。这些争论随着 90 年代苏联和东欧的剧变而引起大规模的对“革命”进行否定的思潮。在一些学者看来，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的不复存在以及中国也转向市场经济这个事实似乎直接证明了“革命”和‘社会主义’在 20 世纪中只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也因此引发了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深刻怀疑。在总体性的解放立场上，德里克是内承马克思主义基本思路的，但在强调与历史条件一致的手段和方式时，他也主张时代环境的变化脱离了马克思的预见，因此必须超出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局限性。这导致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他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过去革命的前提和实践不再有效了。不过，由于“告别革命”是对历史的否定因而也是对解放思想的剔除，他强调革命作为一种新的议程必须重新设计。[②] 这便是其解放议程的内在理论冲动。也由于这一点，德里克不再属于那些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而是声称社会批判的新左派，其中心议题是抵制或反抗。这就使得他把自己的视角转向在日常生活水平上发生的而被大的劳动组织和共产主义运动排除在外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包括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他要求通过使这些社会运动所追求的平等和正义的社会目标概念化而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满足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诉求，关于这种诉求，阿兰·图尔纳(Alain Touraine)明确地强调：“我们应当着手发现新的行动者

①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当前西方激进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受后现代话语的影响，为更契合评论对象的性质和语境，在本文讨论中，我们较多地使用了“政见”和‘声称’来指认一种立场而较少地用“主义”来描述它们。

② 详见《后殖民还是后革命？后殖民批评中的历史问题》，载《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和在我们眼皮底下为社会成型而进行的新斗争。”[①] 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整体反抗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这些运动更具有某种偏爱。

第三节　全球化：新时代的政治课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只能提出自己时代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理想来规范现实，必须从对时代的分析中领会历史展开的真实可能性。这意味着：(1) 那些真正有效地推动历史进步的行动依赖于对时代的把握，也因此必须包含对时代的分析；(2) 随着时代的变迁，那种形式也必须变化，即不可能存在着适应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的革命模式。这样看，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的当代性就不是如何使一个本真的马克思运用于今天的历史环境，而是如何坚持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实质性地发展出相应的新的批判形式。暂且不论德里克是否有志于发展出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他至少对当代西方激进主义左派中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whither Marxism?)这个问题很感兴趣。[②] 而这个问题本身必须变换为“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正确回答，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够使问题的回答置于“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时代中”这个前提上。

① Alain Touraine: *the Voice and the Ey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

③事实上，德里克的《革命之后》的第一章标题即是“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而这个问句又是 1993 年在加州河滨分校召开的一次左派学术讨论会的主题，这次讨论会形成两本具有广泛影响的文本，一是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中译本，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Bernd Magnus and Stephen Cullenberg (eds), *Whither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1995.)，其中包括凯尔纳、斯皮伐克等著名学者的发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出了什么任务？这个问题恰恰是马克思《资本论》之后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上，伯恩斯坦作为第一个叛逆者以《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作了离开马克思立场的回答，而列宁则以“帝国主义论”反拨了这种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在其后的历史中，1973 年曼德尔以‘晚期资本主义’为题发表重要论见从而使早期名不经传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成为一种分析范式的代名词。①

仅从术语看，左派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之后再次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也都没有超出资本主义来分析自己的时代。在时代命名方面，由于“晚期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指证了变化而缺乏对变化性质的指认，它带有不可避免的含糊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它来完成对时代性质的分析。在文化分析领域，80 年代的杰姆逊接过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来指认当前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构架，他又称这个资本主义为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②

事实上，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线索所提出的关于时代的命名，在确定的意义上也只是与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对抗。后者基于资本主义的变化自 60 年代开始也进行了复杂、多元的命名。从“经理(也称管理)资本主义”(钱德勒)“电子社会”(布热津

①值得注意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并非由曼德尔首次提出来的。桑巴特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过去，它已进入了晚期。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 Late Capitalism 的内涵。3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也使用它来指称时代的资本主义(参见《批判理论》),在这之后,莫茨科夫斯在 1943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也用它作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概念之一。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 这一名著使这一术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并为后来的杰姆逊所承继用以分析资本主义当前的文化势态。而差不多同时，哈贝马斯修正了的韦伯方案，用“晚期资本主义”来指称具有新型‘合法性’问题结构的当下资本主义。

② [美]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18、426 页。

斯基)、“信息社会”、“后工业—后现代社会”(丹尼尔·贝尔)一直到当代所谓的“无摩擦资本主义”(比尔·盖茨)、后资本主义或后资本社会(德鲁克)等等,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思潮从未有过中断。

在当前,“全球化”似乎成为一种共识,一种无论左中右都能接受的命名。这个术语自 80 年代兴起,到被普遍地用来描述当代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状态,不超过 20 年的历史。然而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却与它的历史远远不相称,这是因为,它所包含的非意识形态化学术要求恰恰符合 80 年代之后冷战铁幕逐步熔化的需要,而又能够成为 90 年代没有对手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全球化”,作为一种时空经验,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仍然回避了时代的性质这个根本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个条件的性质必须从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分析出来。因此,无论是否使用“全球化”这个名称,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分析都是从属于对资本主义分析这个根本的目的。如果当前的资本主义是与前一阶段的断裂,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当代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基本立场。

关于“全球化”话语,德里克有着十分的警觉,他对这种新型的历史理解范式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他以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敏感性强调,全球化最好历史地来理解,当然,它也提供了新型的观察历史的方法。正因为此,他一方面批判全球化话语与早期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共谋,另一方面,他本人也把全球化作为理解当前世界秩序的视角。他从当前世界秩序的组织原则之资本主义特征(a world order of which capitalism is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出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明确强调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the world order)已经构成包括社会主义在内主要民族国家活动的基本背景。而在 90 年代,他则直接称全球资本

主义(global capitalism)。不过，他使用这个术语，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家不同。后者很少直接强调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形成，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命名都是一种对理论话语、发言权或文化资本的争夺,也即关于命名权(德里达)和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权(杰姆逊)的斗争。德里克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虽然也是从别人那儿借来的，但他认为这一术语所具有的基础意义反映了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与先前同样的实践有质的不同——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①]。因此，他在批判后殖民论时明确地强调,后殖民只是这个新阶段的‘逻辑’体现。[②]

如果说,这个新阶段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须捕获 20世纪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特征的历史变化。这样看,撇开围绕‘全球化’所展开的多维度理论论争,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的全球扩散来看，全球资本主义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事实上，德里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它的特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它占据了重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霸权地位或已经重组了这种关系，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特定的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③] 从这里,我们发现,或许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真正成为一种全球统治，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才显得尤为迫切。当资本主义将历史本身抽象化后，围绕阶级关系的种种压迫和剥削形式才彻底明朗化。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论后殖民性，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后殖民性才能够被准确地定位，才能够言说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也就是说，“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马克思主

① [美]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6 页。
② [美]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版 第 135 页。
③ 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4.p51.

义的最重要政治议题之一。

我认为,正是在这里,德里克开始从一个有影响的汉学家或西方中国历史学家转变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性理论家。他强调,在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它本来应该成长的故乡——资本主义社会。[①] 这种声称可看作是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西方激进左派的一种理论自觉。在这种理论自觉上,德里克试图承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激进主义所面临的问题而寻求一种新型的表达,从而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新激进主义理论家。

客观上,马克思如何回到它的故乡?又是否仅仅回到故乡?对于这些具体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立场上依据的不同理论视角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结论。可以说,经历 7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多元化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在 90 年代甚至发展成每一个个体理论家都可能声称拥有作为个体理论家的马克思,也可以存在没有马克思在场的马克思主义(如德里达)。作为一种共时性的存在的马克思,被撕裂为不同性质和不同重量的碎片,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到反叛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和经济研究中的新左派到自由化的"后马克思思潮",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世界体系论者到后殖民论者等等,加之诸种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景观更为复杂。在上述理论背景中,德里克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这个继自由资本主义(马克思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时代)之后的第三阶段,把它作为"解放政治"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他强调,一种解放政治如果可能的话,那它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替代。围绕这个问题,他用具有同样"两可性"(ambivalence)的"后革命""后社会主义"等术语勾画出一种"后革命激进政见"之理论地图,以期完成一个激进学者对

① 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3.

当前的全球化性质分析以及第三世界分析的理论贡献。

第四节　后革命激进政见: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解放议程

德里克虽然也讨论“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自己也意识到，“我对适合当代形势的解放议程的结论性看法，无法被轻易地视为马克思主义观点，它们反倒可能被看作反马克思主义的。’[①] 这里包括着多重的原因，既包括马克思之后围绕“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定位差异（详见本书第一章），也包括他本人对马克思的自觉批评（详见本书第六章），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历史认识论框架确实脱离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础（详见本书第五章）。事实上，当德里克把当代资本主义当作新社会方案规划的基础时，他充分注意兼容包括世界体系、杰姆逊的文化政治学等等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试图修正其中的不足，也因此他的激进主义声称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其中任何一类。似乎在他看来，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立场代表着对“多种可能的未来’的开放性视角[②]，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传统的左派激进主义在保持某种一致性的同时，更多地拥有差异性。这也直接体现在他强调在不落入过时的政见之陷阱的情况下探讨当下解放议程这一基本立场中。[③] 因此，在他的理论中出现了较多的新术语。在本文的讨论中，考虑到德里克理论之中内含的多元性结构，我们暂不对其理论进行确定的命名。而只是围绕诸如“全

① [美]德里克“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载《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8 页。该文是《革命之后》的第一章

② Arif Dirlik: *Postconial Aura*. Westview Press, 1997, pp2 - 3

③ [美]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球化”和“后革命”等术语之间的关联性描述其激进主义立场的实际导向和外观。

从总体上说，德里克认为，1985 年～1995 这 10 年间，我们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等术语取代了早先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三个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等那套术语，尽管那套术语曾在二战后帮助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标画出世界的版图，但从当代视角看来，它们却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因而再也无法用来描绘当今世界。事实上，他从资本主义的全球变化中也直接引出马克思主义时空前提的问题，认为马克思是按照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条件来构想社会解放的，因此他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直接结论并不能直接作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解放的依赖。相反，20 世纪现实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正在于它们教条地坚持了马克思的直接构想，与灵活变化的资本主义相比反而成为一种落伍。因此，他要求一种“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既包含着宏大的解放要求，又能适应于现实的排除在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妇女、有色人种和土著居民的解放需要。

客观地说，德里克是否提出了一种适应于当代需要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形式，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本文也将在不同的地方进行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他的下列理论基调却是值得强调的 就解放议程而言，我们必须在自己时代的基本背景中揭示真正的问题，必须认真地去探究新的历史变化及其对人类解放的意义，必须揭示新的历史时段的性质。一句话，我们必须提出与资本主义这个发生了质变的阶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即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大致以如下结构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勾画他的逻辑思路。

(1) 作为一种解放议程的马克思主义是构成当前解放议程讨论的不可回避的历史性话语。

解放问题，并非只是马克思主义才独有的论题，但是马克思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